

田维明 著

中国的农业发展： 思考与探索

借鉴吸收国外农业发展的成功经验和思想，善于归纳中国的农业成就和发展规律并将其展现给世界

中国农业出版社



中国的农业发展： 思考与探索

田维明 著

ZHONGGUO DE NONGYE FAZHAN
SIKAO YU TANSUO



中国农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的农业发展：思考与探索 / 田维明著.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3. 10
ISBN 978-7-109-18417-6

I. ①中… II. ①田… III. ①农业发展—中国—文集
IV. ①F32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34877 号

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北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125)

责任编辑 闫保荣 雷云钊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00mm×1000mm 1/16 印张：25.5

字数：450 千字

定价：50.00 元

(凡本版图书出现印刷、装订错误，请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PREFACE / 序 /

欣闻老友田维明教授迎来六十华诞，学院将为其出版论文选集《中国的农业发展：思考与探索》，我很高兴能应邀作序。

田维明教授 1970 年去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农场工作，切身体验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农业经营；我国恢复高考后入北京农业大学攻读农业经济学专业，接受了以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为主的学术训练，毕业后入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专职从事农业经济研究，先后对我国农业体制改革、农产品供求与价格、农业生产效率等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调研和深入的分析。1984 年赴菲律宾大学攻读农业经济学，在那里又系统接受了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和现代经济研究方法训练，大量接触了西方农业发展史和东南亚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学成回国后，田维明教授善于从东西方不同经济理论与实践的视角来考察和分析中国农业问题，特别是将中国农业置于全球背景和历史长河中来思考。此时恰逢世界进入 GATT 乌拉圭回合谈判以及中国面临加入 WTO 的历史时机，他在原来重点关注的农产品市场和贸易领域基础上开始大量关注 WTO 与中国农业的关系，内部递交或公开发表了一批 WTO 对中国农业影响的研究成果。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经济理论体系的教育、大量的国内农村调研、穿梭的国外考察和国际合作研究、频繁的政策咨询参与，使得田维明教授对中国农业发展问题具有不同凡响的深刻认识和理解。他注重借鉴吸收国外农业发展的成功经验和思想，同时也善于归纳中国的农业成就和发展规律并将其展现给世界。农业部、商务部、发改委等国家政府部门委托他进行了一批国内农业经济和国际农业贸易研究项目，邀请他参与了众多的政策咨询会议和经济形势会商。他的研究报告、学术观点和政策建议往往既切中我国现实问题、又具有良好的全局性和前瞻性，从而使人耳目一新又实践可行。今天，田维明教授的部分研究成果结集发表，一定会使同行学人尤其是青年学人获得很多学术裨益。

田维明先后主持了 OECD、FAO、中美、中澳、中日等一批国际合作

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科基金等国家级科研项目及一大批省部级课题，主编和参编了《China's Agriculture at the Crossroads》、《Grains in China: Food Grains, Feed Grains and World Trade》、《WTO与农业简明读本》、《WTO与非关税措施简明读本》、《农产品国际贸易》、《中国农业政策分析与决策支持研究》等10多部著作，在“Agricultural Economics”、“管理世界”、“中国农村经济”等国内外期刊上发表了100多篇论文。人们不难从他的研究成果中明显地感觉到他的研究水平和特点：概念清楚、立论鲜明、逻辑严密、分析细致、依据充分、结论可信。了解田维明教授的人还会情不自禁地在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平等讨论、虚怀若谷、求真务实、潜心钻研、严谨治学的学人形象；他的学生和包括我在内的同行还会从他的治学态度和学术行事中跳跃出淡泊名利、不唯权贵、不讲情面、坚守信念、追求真理的字眼。

这本文集的出版显然能让更多的人了解田维明教授的学术思想和学术工作，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能让年轻学人从中看到和仿效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科学执著、中西贯通以及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学术融合。愿田维明教授老当益壮、继续成果迭出！愿青年学人茁壮成长、超越前人！更愿中国的农业经济研究立于世界之林，不仅为中国农业发展更为世界农业发展做出贡献！

何秀荣

2013年10月7日

AUTHOR'S PREFACE / 自序 /

退休之际，学院组织出版一部文集，作为学术生涯的“纪念”。确实，退休是人生的一个重要节点，到了这一时刻，每个人通常都会情不自禁地回顾自己走过的路。

我出生于新中国建立之初的1953年。在少年期，“大跃进”中全民大炼钢铁的冲天炉火、“三年自然灾害”时糠麸粉成为营养不良者的特供食品、1964年的全国上下“学雷锋、做好事”、“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全民狂热，都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之时，我恰好完成了6年的小学教育，正是这段正规教育为我一生学业打下了扎实的基础。1968年初，毛泽东号召“复课闹革命”，我也因此走入中学，课堂上主要学习《毛泽东选集》、“两报一刊”社论等内容，课堂外频繁地到工厂和农村劳动锻炼。经过一年半的这种教育后，我于1969年10月初中“毕业”。庆幸的是，虽然当时的初中教育徒有其名，但却也给我留有大量空余时间，得以借机阅读当时能够找到的各种书籍，为以后的生涯积累了一些有用的知识。

在“上山下乡”热潮中，我于1970年6月报名参加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来到位于中蒙东部边境的6师51团（1973年交地方管理后改称乌拉盖农垦管理局哈拉盖图农场）。作为一个充满革命理想和英雄崇拜情结的“知识青年”，更准确地说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满怀热情地投入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事业，努力从中“锻炼和改造”自己。然而，加入兵团时对军队生活的那种热情向往并没有维持很长。在现实生活中，我看到了某些兵团干部对上奴颜婢膝、相互间钩心斗角、对下蛮横跋扈的行为，体会到兵团的军队化管理模式对兵团战士思想和生活自由的压制。基于在家读过的一些科学书籍和对实际生活的体验，我觉得滥开垦草原种植粮食存在一些隐患，如随处可见的土壤风蚀现象。现实使我对“生产建设兵团”的合理性产生了某些疑问，然而在那个时代，质疑非但不受欢迎，反而会招致祸害。我在与连指导员谈心时说出了我的见解，结果被团长在

一次大会上不点名地批判为“反对扎根边疆”。在当时的背景下，我只能将不平埋在心头。

由于家庭出身问题，70年代中期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机会与我完全无缘。当兵团转交地方随之放松对知青的管理后，我开始通过自学获取各方面知识。1977年国家决定恢复高考，招生规则将“政治考查主要看本人的表现”作为其中一条，从而为家庭出身不好的知识青年进入大学开通了道路。我参加了该年举行的“文化大革命”后首次高考，但由于缺乏相关知识和答题训练，成绩不尽如人意。随后的半年中，我在工作之余认真自学了中学的数理化知识，在1978年夏的第二次高考中取得了相当优异的成绩。出于要证实自己信念的愿望，我以第一志愿选择了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专业。

我进入大学之时也正是我国启动改革开放进程之际。当时的农业经济教育不可避免地受到意识形态的束缚，课堂上讲授的很多内容与我已经接触过的实践严重脱节。为了回答心中的疑问，我开始有目的地阅读有关国际农业发展的文献，包括一些英文文献。对于一个进入大学后才从ABC开始学习英语的人来说，掌握专业英语词汇并准确理解国外经验无疑是一个挑战，然而我坚持下来了。通过这种阅读，我开阔了视野，同时对中国的农业发展道路也形成了更多质疑，提交的课程习作“对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一些问题的认识”就反映出当时的思考。

1982年毕业时，我分配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工作。农业经济研究所是一个有良好工作氛围的科研单位。所领导思想开明，待人诚恳，乐于扶持年轻科研人员。我幸运地成为农业经济研究所最早派往国外学习的人员之一，1983年末参加了国际水稻研究所举办的种植制度经济评价方法培训，1984年夏进入菲律宾大学攻读农业经济学的研究生，从而较为系统地学习了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应用研究方法。1986年毕业回国时正值国内农业政策改革开始由生产领域向流通领域深化之机。蒙研究所领导信任，我回国后不久就开始担任农产品流通领域课题的主持人和研究室负责人，从而得到参与相关政策讨论的机会和开展国际合作研究的机会。我努力将所学的知识用于科研工作，例如尝试用西方经济学理论解释中国的实践，用计量经济模型和数学模拟模型评估中国农业政策产生的效应，当时的研究成果体现了在这些方面的探索。正是在这一时期，我对中国的

改革方向形成了自己的信念。无论以后国内情况如何变化，这一信念从未动摇。

人生的节律总会有些起伏。90年代前半期，由于国内改革进程发生曲折，我从事应用政策研究的热情处于低谷。在这一背景下，我开始考虑以后做什么、如何做。我自认是一个交流能力弱的人，特别是不善于口头表达，独立做科研比从事教学更符合自己的特点。然而，我从过去的经历深切认识到，中国要实现发展，提高人的素质是关键，否则好的政策也难以实现长效。我感觉，与学生交往要比处理社会中的人际关系更单纯，教育产生的影响要比政策研究更持久，在高校做研究也比在科研机构更超脱。出于这种考虑，我决定转向教育事业，最终于1995年初回到母校。

经济管理学院也是一个有良好氛围的工作单位。回来以后，我在从事课程教学和研究生培养的同时依然承担着较多的科研工作。90年代后期，中国的“入世”谈判进入关键阶段，而开放农业贸易是影响谈判进程的突出问题之一，我有机会承担了相关的科研项目，随后也就把研究领域聚焦在农产品贸易问题上。尽管我仍然相信如计量经济学这样的实证研究方法有其无可替代的学术价值，但考虑到中国发展过程的特殊性、改革以来宏观经济运行机制和微观行为的快速变化、经济指标概念和统计方法的频繁调整影响到统计数据质量等现实情况，不再把建立计量经济模型看作是研究工作的核心任务。这一段的学术成果既有针对长期发展问题的学术理论研究，也有针对近期国内外突出问题的定性分析和对策研究。与过去相比，这一时期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农业部门自身角度的束缚，开始把农业发展放在国民经济发展、把中国放在全球经济体系之中做深入分析，尽力以独立客观的态度探索中国繁荣昌盛之路。

中国过去30年的改革历程史无前例，中国独具特色的农业发展实践经验是当前任何一种经济理论体系都无法圆满解释的，这为本领域的学者提供了广阔的研究空间。然而需要看到，虽然当前国家对科研的支持力度远较过去为大，但学术环境的变化并不尽如人意，研究项目立项、承担者选择从而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继续取决于资助者的特殊“需求”；研究人员的行为目标选择趋于“务实”，对研究成果如何满足现行评价指标的关注远甚于对实际情况的如实把握和深刻理解。针对中国农业发展过去的实践和未来的需要做扎实严谨的科学研究工作仍然任重而道远。

我的学术生涯恰好见证了中国的30年改革。本文集是从这一期间完成的论文中摘选出来的，在编辑成集过程中仅对文章中的一些文字做了修润，个别概念也改用当前流行的术语来表达。这些文章与其说代表了我在学术生涯中取得的重要研究成果，还不如说如实展现了我在学术上的求索，或者说心路历程。在更广的意义上，这些文章产生于特殊的背景，其关注的焦点、涉及的经济学理论、应用的分析技术甚至写作的规范性均显现出30年来中国农业经济学术研究进展的时代烙印。希望本文集在聊以自娱之外可以为后来者提供某些参考借鉴。

蒙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和国际贸易系领导的高效组织，本书得以在较短时间内编辑成集。蔡海龙老师负责文集出版的具体组织安排，李德源参与了早期文稿的录入和校对。本书出版得到中国农业出版社闫保荣编辑的大力帮助。在此对上述各方面人员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

田维明

2013年10月5日

CONTENTS / 目 录 /

序
自序

| | |
|--|-----|
| 对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一些问题的认识 | 1 |
| 关于农业企业规模经济研究和政策分析的理论和方法 | 14 |
| 建立我国农业宏观计量经济模型为实现农业经济决策科学化服务 | 28 |
| 对我国农业基本建设投资效果的计量经济研究 | 36 |
| 对我国农产品成本与价格问题的思考 | 57 |
| 剩余产品商品经济 | |
| ——我国现阶段农业经济的基本特征、运行方式及调控手段 | 65 |
| 稳定和效率的权衡 | |
| ——对我国粮食收购体制的实证分析 | 96 |
| 我国经济中的价格形成机制和农产品价格变化趋势 | 105 |
| 中国粮食生产的技术效率 | 127 |
| 绿色保护主义及其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 | 138 |
| 我国粮食市场上的价格联系 | 145 |
|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我国农产品贸易的影响 | 157 |
| 中国测算农业支持水平的经验和方法问题 | 181 |
| 农业多功能性对中国和世界农业发展的含义 | 199 |
| The Socioeconomic Roles of Agriculture; National Report of China | 211 |
| 世界农产品供求演变趋势和重要特征 | 265 |
| 我国加入 WTO 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影响 | 292 |

对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 一些问题的认识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5亿农民在很短时间内就走上了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农村中出现了新的生产关系并带来生产稳定和较快的增长。农业合作化对我国以后的农村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因此对合作化的一些问题进行分析仍然有现实意义。

一、社会化大农业是各国农业发展的共同趋势

传统的小农经济结构迅速地为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管理知识基础上的社会化、企业化的经营方式所取代，是近一个多世纪以来不断发生的历史变化。尽管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所采取的形式和发展速度很不相同，但却和生产力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

社会化农业不同于以自给自足为目的的传统小农经济。小农经济相互间的交换联系只是偶尔发生，并处于从属地位，而社会化农业则经常和比较固定的进行市场交换，从而和整个社会经济活动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以满足社会经济的需要；它是将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管理知识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生产的农业，而不是依赖于传统经验和生产工具的农业；这种农业发展的趋势是越来越细的专业化分工和农业向工业化方向发展，以便更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和经济资源，与其他部门更密切地结合成一个相互依存的经济体系，而不是小而全的传统小农半封闭的自然经济，社会化农业在对自然界的利用和改造的规模方面，在创造的劳动生产率和生产出的农产品数量方面都是小农经济农业远不可比的。

小农经济是生产力不够发达情况下的一种生产方式，从属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在封建社会，分散的、细小的传统小农经济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存在大量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农场，但是无论从利用的生产资料的数量上，从生产的目的和规模上，从社会联系的方式上，都与传统小农经济有本质的区别。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小农经济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的一部分。东欧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存在相当一部分个体农户，

并且在有的国家的农业经济中，个体经济成分还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它们是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一种成分。

在我国，建立在小土地所有制基础上的传统小农经济以家庭为生产单位，以满足自己需要为主要目的，具有“小而全”的特色。这种依靠直接经验和传统生产技术及工具的小生产，劳动生产率和产品商品率极低。正如同马克思所指出的：“小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就排斥社会劳动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累，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不断扩大的应用。”这种落后的生产方式与近代社会生产力高速发展的要求是根本不相适应的，因而改造传统小农经济是任何社会化大生产获得发展的首要条件之一。

二、我国农业合作化发展的道路

我国是一个人口多、耕地少的国家，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造成我国贫困和文化落后的状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我国近代并没有得到有决定意义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前农民大部分还处于封建统治下。这使得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具有独特的特点。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党的领导下，全国范围内迅速地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这一运动是为了“废除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解放农村生产力，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无地和少地的贫苦农民获得了7亿亩*土地和大量的生产、生活资料，免除了700亿斤*的封建地租剥削。

土地改革的胜利，彻底摧毁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形成大量小土地所有制的小农经济。免除了封建经济剥削的农民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作为主人和土地、生产资料直接结合，使得生产积极性得到极大的发挥。同时国内的和平环境，国家实行扶助农业发展的政策和经济上对农业的支持，促使我国农业在短期内取得了高速发展。1952年的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48.5%，平均每年递增14.1%；粮食总产量达到3088亿斤，比1949年增长42.9%，人均占有粮食从1949年的399斤增加到1952年的537斤。农民初步过上了温饱的生活。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小农经济开始显示出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建设和高速发展，人口的增加和人民消费水平的提高需

* 亩、斤为非法定计量单位，1亩=1/15公顷，1斤=500克。——编者注

要农业能够稳定地提供充足的原料和食品供应，因而要求农业要有一个与此相适应的发展速度和经济结构。而土改后形成的小农经济规模极小，平均每户只有十多亩地，自有生产资料不足以进行生产。农民为了满足自己的多种需要以及较为均衡地安排劳动时间，又不得不在这样狭小的土地上种植多种作物。这种小农经济不能合理地利用土地和自然资源，也无法使用较先进的生产工具，产量和劳动生产率很低。1954年全国粮食每亩产量仅184斤，这种低水平的生产，除维持农民家庭自身需要以外没有很多剩余，商品率和进行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很低。显然这种极为分散和落后的小生产不能满足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要求。此外，小农经济经常不断地发生两极分化，一些农民失去土地重新沦为贫雇农，极少数一部分农民利用搞雇工剥削、商业投机和放高利贷等迅速发家致富，表现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强烈欲望。两条道路的斗争作为一个严重的问题摆在面前，因而改造小农经济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而且也是一个极为迫切的政治任务。

改造小农经济可以走什么道路呢？

一条是发展资本主义农业的道路，那就是在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经历过的历史过程——使大量的农户不断破产沦为雇佣工人或进入失业大军，在土地和生产资料不断集中的基础上确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农业中的统治地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一定时期可以使农业实现较快发展，但那是一条充满痛苦和动乱的道路。可是在当时的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农业是行不通的。原因在于：在党领导下经过多年英勇奋斗而刚刚摆脱封建剥削的农民，绝不愿意再接受资本主义的剥削，更重要的是我国已经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劳动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在已经能够认识资本主义历史局限性的时代，我国不能也没有必要走资本主义道路。

另一条是苏联式的集体化道路，将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在此基础上建立集体农业。苏联的实践证明，剥夺作为劳动者的农民的生产资料，会引起农民的不满和富农的反抗，从而影响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苏联从1928年开始全面实行农业集体化至1936年的10年中，农业总产值始终低于1928年的水平，与此是有一定关系的。在当时我国农副业占工农总产值的一半，而社会主义工业基础薄弱，短期内不能给农业以技术上较大支持的情况下，采用苏联的集体化方式是不可取的。尽管土地所有权在任何社会制度下都是生产社会化进一步发展的一种阻力，但只要新的生产方式能给农民带来更大的经济利益，引导农民自觉地改变旧的土地所有制是完全可能的。

还可以参考第三条道路，即在社会主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同时，保留个体农业经济，采用政治和经济措施限制其向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可以采用价格、税收等经济手段调节市场供求关系，促进发展个体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的固定的合同关系，使个体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紧密地结合起来，并逐步实现对其的改造。这样做并不会出现社会主义工业和资本主义农业并存的情况，南斯拉夫的经验说明了这一点。但是个体经济总归是一种落后的方式，并常常伴随着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这种个体农户的经济效益是非常低的，以南斯拉夫为例，1973年个体所有单位占有85%的可耕地和大约91%的牲畜，但只占农业总产值的70%和市场供应产品的60%。这条道路在长时间里一直被认为是修正主义道路。

中国在自己独特的社会条件和经济条件下实现对农业的根本改造只能走自己的道路。党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在合作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方针，提出农业合作化分三步来走，由互助组、初级社过渡到高级社，“这种由具有社会主义萌芽，到具有更多的社会主义因素到完全的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就是我们党所指的对农业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土地改革以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是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农民作为小私有者，力争通过发展生产来获得较好的生活，并且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也利用剥削手段达到发家致富的目的。作为劳动者，他们反对剥削。占绝大多数的贫下中农本身生产资料不足，不依靠互助合作就连正常的生产都难于维持，因而具有互助的传统和积极性。过去受剥削之苦和土改后两极分化的事实，党领导的互助合作成功的范例教育了农民，只有互助合作才能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这决定了绝大多数农民愿意而且可以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封建统治，给农民分了土地，并在很短时间内就使农民改善了生活。二十多年为革命共同奋斗的历史使农民认识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相信党指出的农民合作化的道路是正确的。这是使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极为重要的一个政治条件。社会主义经济力量的增强，可以越来越多地为农民提供生产资料，可以建立有利于农民的商业联系和保持稳定的物价。社会主义国家可以用政治和经济措施给农业以支持。这些条件使得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成为可能。

在党的领导下，1956年我国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合作化，新的生产方式带来了生产的增长。1956年农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20.5%，粮食总产量增长

18.2%，农民人均总消费额增长 15.7%。组织起来的农民，实行劳动力统一调配，土地统一经营，能够从事小农经济下一家一户所不可能办到的改造自然的斗争，因而大大提高了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使生产潜力得到更大的发挥，我国农村出现了崭新的面貌。

农业合作化是一次极为深刻的革命，它改变了几千年小农的劳动方式和生活方式，在农业中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这一巨大的变化没有引起生产的波动，而是稳步的上升，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生活也有了较大的提高，这说明我国农业合作化是成功的。

党的指导合作社发展的正确方针是合作化得以顺利实现的重要保证。在合作化运动中，党始终强调坚持自愿和互利的原则，采用“国家支援，典型示范，逐步推广”的方法，并且提出：“增加生产量，增加社员收入，从而使农民能够把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经济繁荣看成是不断增加自己物质与文化幸福的主要源泉，这是办好农业合作社的根本标志。”党始终注意依靠占农民绝大多数的贫下中农，注意尽快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同时又注意保证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经济利益，使他们在参加互助合作以后生活水平也能逐步有所提高。党引导农民逐步认识和解决生产中暴露的矛盾，推动合作化一步步向较高的形式过渡。在合作社的管理上实行民主办社、勤俭办社的方针，使农民能够实行对生产的管理和监督，在实践中健全劳动管理制度。在发展生产合作社的同时，组织农民举办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在流通领域排除了资本主义剥削，并使集体经济紧密地与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联系起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原则没能得到完全执行。但是实践证明，凡是执行这些原则较好的，合作社就巩固，生产和社员生活都有较大增长。

在我国这样一个地多人口少、经济力量薄弱、文化科学落后的国家，在当时帝国主义封锁和国内阶级敌人破坏的情况下，我国农业保持持续增长，从而使社会主义的工业有了飞快的发展，同时也给农业的技术改造奠定了一个较好的基础，说明我国农业合作化的道路是正确的。即使今天看来，它仍然是最适于我国情况的改造小农经济的道路。

三、对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一些问题的认识

在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党根据当时的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党的发展农业的指导思想和这些政策措施，不仅指导了农业合作化运动，而且对于以后的农业发展有巨大的影响。因而分析这一历史

过程中存在的某些问题仍是有意义的。

下面从表 1 中的一些数字来看一下农业合作化时期我国农业的发展情况。

表 1 1952—1957 年部分农业经济指标指数

| | 1953 | 1954 | 1955 | 1956 | 1957 |
|------------|-------|-------|-------|-------|-------|
| 农业总产值 | 103.1 | 106.6 | 114.8 | 120.5 | 124.7 |
| 粮食总产量 | 101.6 | 103.9 | 113.2 | 118.2 | 119.8 |
| 粮食单位面积产量 | 99.9 | 100.3 | 107.4 | 106.8 | 111.4 |
| 农业物质消耗 | 107.5 | 116.7 | 122.8 | 132.3 | 137.9 |
| 每个农民人均净产值 | 100.2 | 101.0 | 106.4 | 110.1 | 110.5 |
| 每个农民人均总消费额 | 102.6 | 105.5 | 113.3 | 115.7 | 122.0 |
| 全国人均占有粮食 | 99.4 | 99.3 | 105.9 | 108.1 | 106.6 |

注：表中数据根据《农业经济资料手册》算出。以 1952 年的基数为 100。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1952—1957 年农业总产值增长了 24.7%，速度是比较快的。同期每个农民消费额增长了 22%，这说明，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生活水平也有了较快的提高。但是在这一段时间农业总产值中的物质消耗增长了 37.9%，远远超过总产值和净产值增长的速度。这说明在当时生产技术和劳动工具没有大的改革、生产的增加更多的是依靠劳动力和劳动时间增加的情况下，经济效果表现出下降趋势。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和平环境下，我国人口迅速增长，1949—1957 年平均年递增 2.2%。因而尽管从 1952—1957 年粮食总产量增长了 19.8%，可是人均占有粮食数量却没有显著增加，最高的 1956 年人均 581 斤，比 1952 年增加了 44 斤；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增长也不快，1957 年平均亩产仅 204.1 斤，比 1952 年增加了约 20 斤。我们可以以每个农民人均净产值的增长情况来估计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五年中增长了 10.5%，平均每年增长仅 2.0%，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农业合作化在引导农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方面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在根本解决农业问题上取得的经济效果没有预期的那么好，出现了一些不合理的情况。下面就导致出现这些情况的原因提出我的看法。

（一）农业在国民经济的地位问题

旧中国是一个经济非常落后的国家，工业基础极为薄弱。1949 年新中国成立时工业总产值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23.2%，而农副业则占 69.9%。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迅速奠定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实现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

改造成先进的工业国的目标，我们根据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实行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国家通过农业税和较低的收购价格直接间接地从农业积累资金。1953年—1957年，农民积累总额达200.1亿元，占同期积累总额的20.7%，为同期农业投资的6.6倍。这样做的结果使我国在较短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比较独立的工业基础，对于以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无疑具有极大的意义。但是在农业自身积累能力很低、而进行农业的技术改造又耗资巨大的情况下，这不能不影响到农业的发展速度。

马克思指出：“超出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并且首先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社会主义工业的发展要与农业的发展相适应。新中国面临着的不仅是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改造成先进的工业国的任务，也面临着把落后的传统农业改造成先进的社会主义大农业的任务，而这两个任务是不可分开的。没有农业的发展，工业的发展是不稳固的；而没有工业对农业的支援，农业也不可能实现技术改造。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始终感到农业不能提供充分的粮食和工业原料的沉重压力，党也下了很大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建立合作社，就是为了解决农业的发展与社会主义工业的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但是当时更注意的是社会改革，而没有更多地采取对农业的技术改造和经济支持措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中农业投资为15.34亿元，仅占总投资额的2.8%，这与农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极不相称。当然在合作化时期的经济情况下，我国还不可能做到对农业大量投资；而在以后的年代，我国又相当大地忽视了对农业的技术改造，这是我国农业长期难以改变技术落后和生产水平低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农业生产关系变革问题

合作化过程中农业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是为了解决农业不能够满足生产和生活需要的尖锐矛盾，也是为了使农业合作化的步骤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步骤相适应，以实现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我国的农业合作化能够在短时间内顺利实现，与党在农民心中的崇高威望、与劳动人民相信社会主义能够带来那种“耕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的幸福生活而产生的巨大政治热情是分不开的。

手工劳动方式的小农经济不容许生产力有较大发展是非常明显的。在这种劳动方式下，一个劳动力一年不过生产一两千斤粮食，而这种劳动生产率早在封建社会就已经能够达到了，因而改造这种生产方式就表现为现代生产力发展